

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和民意测验

M·茵格利格尔

“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这个概念已出现在喀麦隆的公众言论当中,“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也遍地开花¹。但另一方面,尽管建立了培训民调员的新学校,民意调查仍不能做到完全客观,无法作为事实本身,迫使喀麦隆的政客和政界予以认可。这种矛盾现象以往曾普遍受关注(Eir

gueleguele, 2000),对喀麦隆“公众舆论”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在喀麦隆,表面看来,民意测验好像已经掌握了“公众舆论”概念,因为“测验”和“民调”经常告示天下,被媒体特别是私人媒体广泛报道,作为评说时政的依据。可以说,康维斯(Converse, 1987)和盖洛普(Gallup, 1937 and 1953)已征服热带,按照他们的理论,民意测验的结果就是“公众舆论”。

但细想起来,仍有充足的理由让人怀疑这种说法。一个问题在于,这个概念的含义尚众说不一(Blondiaux, 1997; Gunn, 1989; Meyer, 1991);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新建立的喀麦隆的民调员学校也说不清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到底是什么,它常常混同于“大多数人的观点”^④这恰好说明了问题所在——但1948年布鲁默

(Blumer)的文章和后来1995年康纳汗(Conaghan)的观点,尽管背景不同,却都掩盖了这个问题。

在此,第二个悖谬现象或许值得一提:几年来“测验”和“民调”在喀麦隆如雨后春笋,可它们既不能把握也不能测度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很少影响到老百姓对时局

的理解。尽管如此,它们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们毕竟提供了1990年代“转型”(Dobry, 2000; O'Donnell, Schmitter & Whitehead, 1986)以来的公众言论的情况^(四)。此外,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民意测验”,我们也无从得到如此清晰的教训。

在进一步分析第二个悖谬现象之前,为了认识上的准确明晰,必须提出另外两点,以澄清眼下的问题,

超越表象的常识,使讨论的重点更加明确。

首先,在喀麦隆,政治性的“测验”或“民调”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个基本问题,可以立刻回答如下:喀麦隆新建的民调员学校和弄潮儿们使用的这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指的是各种各样没什么共性的“调查”,他们几乎都没有对广大的人口进行“抽样”;他们在提问时不大考虑人们是否理解这些问题;设计

莫利斯·茵格利格尔(Maurice Engueleguele)是皮卡迪行政与政治大学研究中心(CNR-SUMR 6054)和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讲师兼研究员。他主要研究“转型”时期中非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另类符号产品的可行性。Email: M-engueleguele@yahoo.fr。

(更准确地说是拼凑)调查的都是些生手,媒体报道经常以某种政治效果为目的;还有,它们统统被视为直接民主的工具^{1/4}。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刚刚移植到喀麦隆,目前,从各个方面看都问题重重。这些共同的征候,加上刚开始流行,至少在最初,人们很容易把这些政治性的“测验”和“民调”看作欺世之谈。而且,即使我们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把喀麦隆国内的“选前测验”、“舆论调查”、“读者问卷”和“特别调查”——区别开来,它们或这种区分又有什么科学价值呢?

其次,对于遍及喀麦隆的“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的批评(Engueleguele, 2000),大多数民调员和喀麦隆媒体——民调结果的主要用户——都充耳不闻。这是因为,对这些民调,政治家利用,小公司操作,媒体刊登(然后记者写社论和文章加以评论),他们彼此进行着公开的商业和政治竞争,关键所在是其中的象征意义和经济利益,谁也不会关心什么科学性,什么限定、严谨和避免情绪化等等;正是这些特性使民调具有科学性,使之避免了简单粗糙,而这种简单粗糙正成为民意测验的主流,在媒体和政治辩论中都如此。

接下来,我准备简单回顾一下喀麦隆“公众舆论”概念的起源,然后提供一些线索,看一看喀麦隆的大量“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给了我们怎样的经验教训。

喀麦隆“公众舆论”概念的由来

首先应该认识到公众言论背后的法则,换句话说,应该理解福柯(Foucault, 1969)所说的话语出现的条件,即支配话语形成的基本规律,这样才能明白言论的含义,认清其深层的逻辑或隐含的“语言”,才能把它放在它所属的“意义体系”当中(Bon, 1991)。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研究

喀麦隆的“公众舆论”的构成方式,就能把表达民意的话语还原回具体的政治和意义领域中去。自非殖民化运动以来,“公众舆论”出现在喀麦隆公众人物的言谈话语中,通过简略回顾这个术语的历史,我们可以阐明: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种概念的模糊不清绝非公众人物的初衷。

从殖民时代的结束到政治市场的垄断

在非殖民化时期,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大体就是那些政界人士就国家大事发表的意见:这些人属于精英集团的核心层,实际掌控着政治权力,自以为有资格以公众意见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看法。A·M·姆比达总理在喀麦隆议会的就职演讲^{1/2},他的继任者A·艾乔在1959年2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3/4},以及后来的S·卡姆^⑧都说过:“喀麦隆的公众舆论认为……”,这等于说“我和大家想法一样”,或者“大家和我想法一样”,也等于说“我们和大家想法一样”或“大家和我们想法一样”。A·艾乔总统成功地实行了一党制(1966年成立喀麦隆民族联盟),粉碎了所有的“不同政见”(铲除主要政敌或让其自动出局),统一了国家(1972),从而垄断了喀麦隆的政治市场,这是他政治成就史上的得意之笔。无论以前怎样,此时,“公众舆论”自然就成了领导人、当局或官方的声音(Engueleguele, 2000)。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喀麦隆的“公众舆论”根本不代表“全体喀麦隆人”(假如这个短语不是统治集团长久以来杜撰的说辞,而是还有点意义的话)。实际上,这个概念的范围仅限于一块很小的竞技场:一小撮政客在这里争权夺利。他们或者其中部分人,宣称除了个人利益,他们还表达普遍的利益;而对立派,用赫尔曼·贝勒(Beyle, 1935)的话说,则专门“阳奉阴违,或巧用伎俩,以博取大众的同情”,或者

说,至少从当局的立场看,反对派攫取了为“民众”或其中部分人代言的机会。换言之,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尽管不无现实效果,但不过是虚幻的权力之争的产物。各种类型的权威人士,有时是自封的权威人士,在各种竞技场上抢着表达人民的思想、愿望、要求和情感。

1990年代的“转型”

1990年代初,政治的相对宽松使喀麦隆的“公众舆论”获得了新的含义:它现在涵盖的是那些被当作政治看客或当作权力斗争仲裁者的民众。这些斗争仍旧发生在大人物之间,他们承认政敌的合法性,同时为赢得斗争,尽管很少听取民众意见,但还是运用手段,以争取民心。在激烈的政治辩论中引用喀麦隆的“公众舆论”成为一种策略,目的是建立“公众的监督”,以迫使当局(或者说“比亚政权”)谨言慎行。“公众舆论”被频繁援引,参与公共辩论的人士及其反对派可以用它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在辩论中求助于公众,把他们当成双方之外的仲裁者,把过去被排斥在政治斗争之外的民众接纳进来,寻求政治角斗场的局外人的支持,成为开放讨论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已经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话语工具,可以用来区分当权者的语言与反对派的语言,为反对派提供支持。同时它还被看作是一种公共力量,要求(至少应该要求)参与公共辩论的大人物们(不管他们是否属于现政权)为了达到各自目标,必须遵循一定规范。

但是,可以看出,上述对“公众舆论”概念的理解经常相互缠绕,其中“公众”(public)概念与“群众”(masses)一词彼此混淆。从莫萨·雅雅、A·艾乔和奥古斯丁·康乔·郭米尼的下列谈话中,可以发现一个语义连续体:

(需要启发)群众理解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什么,以及党(喀麦隆联盟——编者注)的目标是什么(引自喀麦隆联盟为解释其新闻政策和关于建立党报召开的会议, Ngaoundere, 5 July 1959, p. 35)。

喀麦隆民族联盟及其相关组织为自己制订了任务,要立刻并经常性地为群众提供公民教育,把纪律性、责任心和牺牲精神灌输到舆论中去,灌输给人民(……),以利于经济和社会进步(喀麦隆民族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辞, Douala, 15 February 1975。这几乎逐字重复了喀麦隆民族联盟宪章第十条的用辞)。

(……)公众舆论如果得不到培育,就容易(……)被人滥用(1992年10月11日总统选举第二天,信息部长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提交的批评报告)。

在上述言论中,这两个概念(“群众”和“公众”)没有区别,在行文语义上前后相连,由于“公众舆论”一词不是用来直指意见的形成过程,或被咨询的人数,或意见形成的独立程度,所以上述混淆就更容易发生。援引公众舆论成为某个人或一小撮人的特权。结果,就排除了通过区分“公众”与“群众”来澄清公众舆论概念的可能性。有人做过这种尝试,美国战后的社会学家曾区分公众社会与群众社会(Price, 1992; Wright Mills, 1967)或“公众”概念与“群众”概念。布鲁默(Blumer, 1955)也曾试图把这两个概念与“人群”(crowd)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公众”一词应该指这些人,(1)他们面临特定的问题,(2)他们在如何解决问题上想法不一,(3)他们开始讨论该问题。另一方面,“群众”则是一些匿名的个体,彼此没有沟通,几乎没有被组织起来。

在上述喀麦隆的诸种“公众舆论”之外,还出现了另一种类型,处于喀麦隆政治自由化的中间阶段的人们求助于这种“公

众舆论”，借此证明自身行动的合理性，它涵盖的也是不同的人群：包括各部落、各教派、秘密组织和帮会。在这些圈子里，喀麦隆的“公众舆论”被看作是各个集团互动的结果，其中一些集团年深日久，但在1990年代初关于传统和文化身份的立法通过后它们才如雨后春笋般浮出地表（不仅包括传统的组织，如“爱辛甘”、“拉卡姆”、“尼贡达萨瓦”、“姆波”、“尼果恩”、“麦顿巴”和“库波”，而且还有玫瑰十字军、共济会及其它组织）。它们的共通之处是，虽然都参与政治，但又怀疑传统的个体观念。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作为党派中的平等一员，个体在政治上不能只被看作个体，而应看作一个或若干组织的成员。因此，政治的单位不再是个体，而是“群体”，即由部落、语言、神秘信仰或者共同事业或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的个体的总和。因而，“群体”能够成为表达民意的补充手段，“（……）喀麦隆的公众舆论既然是各种民意的总和，在选举期间各方表明立场的时候，就不能忽略这个手段”^(t)。因此，这些群体一直是各种游说组织或利益集团为达到各自目标而招募的对象（Engueleguele, 2000）。

“民意测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喀麦隆的民调员新学校声称，凭借“民调”他们能掌握和测度喀麦隆真实的“公众舆论”。但是，围绕“公众舆论”的含义和地位的疑团并没有消散；事实上，他们在这两个问题上失败了。从政治上说，必须重新界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因为应该遵循（直接）民主的逻辑：说到底，要想了解“人民”在想什么，何以不直接问他们自己，而非要听那些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的利己的想法呢？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某些喀麦隆人，尤其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方法：据说，小型全民公决能够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准确理解和检测喀麦隆的

“公众舆论”（用B·鲍恩格拉的话说就是“公众意志”），它一再让那些“与伪造的选举名册上的选举人完全不同的（……）”、被认为能代表“真正”选民的“抽样”们来“投票”；借此，喀麦隆的民调员新学校实际上是要解放个体的政治积极性，使之不再受当局的钳制，与此同时，民调员们“多方动员”（Dobry 1986, republished 1992），目的是推翻整体划一的旧秩序。但两个目的没有一个能实现；喀麦隆的“转型”并未导致一个雅各宾式的革命，而是造成新政治秩序中各派力量彼此妥协，这个新秩序使各派保留了地位，即使未获巩固的话。

这次失败后，喀麦隆的民调员新学校不意再次遭遇失败：实际上，他们使喀麦隆政治体制中的大人物们仍然“把持”权力，原因是，他们所说的“舆论”不过是那些代表性相当含混的人们对问卷的反应，这些反应模棱两可，其中的多数观点就充当着喀麦隆的“公众舆论”，这就给那些大人物可乘之机，可以随意解释并操纵调查结果。因此，一位前任部长在接受采访时主动出击，问采访者什么是“喀麦隆民意测验的真正价值”，口无遮拦地说：它们“（……）不过是喀麦隆人愿意在本国看到的民主游戏的幻觉，对它们（……）不应该太当真”^(u)。从这种观点看，喀麦隆民调员新学校所采取的方法与“喀麦隆进步的、安抚式的民主”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少数公民填写的那些选票不但算数，而且将其引申为全体喀麦隆人民的意愿。

总之，如果想找到各种喀麦隆的“公众舆论”的共性，那是枉费心机，惟一的结论是，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正在于它的含混性或多样性：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本身就特别地飘忽不定（Blondiaux, 1997；Durham Peters, 1995）。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说从喀麦隆的“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



1992年10月10日保罗·比亚总统的支持者们举行集会。Francois Rojon 摄影/ AFP 供稿。

中能得到什么教训, 至少也是不容易的。

喀麦隆“民意测验”提供的教训

喀麦隆用民意测验来测量的“公众舆论”, 就其基本特征来说, 无论如何与先前使用的任何概念都不相匹配, 而且排除了其它可以获得共识的定义, 即使在公共言论中那些大人物的有限圈子里亦如此。我们只能说, 它“实现了”(在这个词的基本含义上)喀麦隆的“公众舆论”, 把先前只是人们所思所想的意愿表现出来: 同时, 它又“阻滞”了人们的意愿的表达, 用一种人为的(设计、整理并简化的……)社会组织或形式代替了各种动态的联合(精英的意见, 权威、国家体制、发言人和代表等等的声

音), 而最终又让人信服。但如果换个角度, 问一问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教训, 那么情况就没有这么悲观了: 在喀麦隆, 日益增多的“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它们让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国家1990年代初以来公共言论的情况。我想以下四点教训很可以说明问题。

推翻传统的代议制逻辑

“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试图形成一种全新的立场, 好让喀麦隆的“公众意见”介入公共话语, 就好像是一位接受提问的匿名作者在对一些重要问题发表评论, 而这位作者又是一个由不断变化的各色人员组成的群体。此外, 这个群体还被当作专家垂询, 他们可以判断和评论时局:

你如何看待人民的正义?

你认为 SDF 会议之后谁会成为 SDF 主席? (1999 年 10 月 26 日《伊萨哈·波》进行的“民意测验”,在 <http://www.boh.org> 网站调查了 1 006 人)

你认为政府应该释放那些被捕人员吗(作为反腐败运动的一部分)? 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公开性国际组织曾一度把喀麦隆划为世界上公认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2000 年 1 月 10 日发表在《信报》电子版上的“反腐败运动民意测验”)

你认为保罗·比亚阁下取消学费能改善喀麦隆的教育吗? (《爱国者》进行的“民意测验”,2000 年 1 月 20 日发表在 <http://www.gcnet.cm> 网站上) ⑤

答卷人被要求做出预测,给出判断。但是,真正的专家只会在擅长的领域内提供咨询,而“公众舆论”却信马由缰,可以就各种问题发表意见,从正义、政党间的民主论战、好政府,到教育状况和青年的困境,无所不包。民意测验和调查似乎要传达一种错误的信息,似乎每个人的政治见解都同样权威(Hall et al., 1994),因而给喀麦隆引入了一个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公民形象——对这种神话, W·立普曼(Lipman, 1922, 1925)在为一些至今仍负有盛名的出版物撰文谈论其它问题时曾经揭穿过。这样,这种方法就推翻了代议制的一贯原则,在代议制中,政治专家成了全权代表;而这里的前提却是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也就是接受调查的对象)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和安全有同样的发言权。然而,这种意义上的专家是一种错觉:如果总统真想知道是否应开展反腐败运动,是否应把国家自来水公司(SNEC)私有化,是否应打击有组织犯罪,他要咨询的肯定不是喀麦隆的“公众舆论”。他会从别的渠道得到启发,会咨询其他“专家”。

从民意测验反映了广泛多样的意见上

说,它提供的判断还是“有意义的”,尽管这些判断应该说代表的是同一社会群体,而且提的问题也常常雷同。亲政府的《爱国者》报的“民意测验”结果发表在 2000 年 1 月 20 日的电子版上,显示“年轻人完全支持比亚总统”,但全国公民行动委员会(National Civic Action Committee)2000 年 3 月 31 日“调查”的结果却是“年轻人认可比亚”,这就反映了不同的见解。为了理解这种矛盾现象,我们不仅应考察两个调查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特别是如何抽样、如何提问以及民调员打算如何使用这些结果(Conaghan, 1995),而且还要知道“年轻人”是喀麦隆公共话语中各派别较量的关键所在。能够或自信能够通过援引“民意测验”的结果来代表这一群体发言,对于参与公共话语的各方来说是一种力量或资格,这种力量或资格在公共话语每一领域的斗争中都能转化为一种强势地位。在喀麦隆政坛上,借用“年轻人”的名义显然能最直接地获益(因为从数量上看,无权无势的年轻人在喀麦隆人口中占大多数):有“民意测验”做后盾,就可以宣称贴近这个社会群体的想法,有资格为他们代言,承担起保护年轻人利益或前程的使命。那些打着“年轻人”事业旗号的伪君子妄称,自己在争取掌握年轻人的竞争中能把其他人甩在后面,但他们却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他们是把年轻人甩在了后面,因为他们剥夺了年轻人自己发言的机会。

揭开政治后院的秘密

“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的一个主要贡献——其委托者、操作者或评论者很少注意到——是提供了有关喀麦隆的政治以及各党派政治游戏的后院信息,连同他们随处使用的手段、彼此冲突的野心、对领导职位的争夺和觊觎,这样就削弱了政客们

围绕“政治”想要设计的和已经具备的(或想要传播的)公众形象,因为在这里“政治”首先被看作是个人目标之间的冲突。由私人媒体和《SDF 一回声》发表的几个主题广泛(比如赞成在建立一个独立选举委员会之前抵制选举,赞成 J·福如·尼蒂参加总统竞选,以及经济和社会规划)的“测验”和“民调”,都是由社会民主阵线委托进行的,它们与该党一些成员——包括一些知名成员——被开除或暂停党籍的事件不谋而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Engueleguele, 2000)。

将公众目光引向政治生活的另外方面,很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社会群体(特别是被统治阶层)自该国开始“转型”以来通常对公众话语的理解方式,尤其加深了一大群“公众”,特别是受到目前焦点问题(政权的政党轮替、消除贫困、反腐败、改善教育条件、与失业做斗争、改善医疗体制等等)鼓动的年轻城市居民与其政治对立面之间的分歧。它强化了这些群体失望幻灭的情绪,同时鼓励这样的看法,即政治不过是“欺骗人民”的手段¹¹,其目的主要是“食甘自肥”¹²。

这些就是操纵政治参与的决定因素及其回报(Gaxie, 1993),在学习民主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些问题,必须采取积极立场,既反对所谓政论家在全国性媒体上阐发的理论,也反对教化主义的“老手”将此看作“喀麦隆民主的危机”。[真是这样吗?“追求共识的民主”只是名义上的吗(Lijphart, 1987)?难道不该用“非自由的民主”或“事实的民主”来看待它们吗(Quantin, 2000)?被引爆的“危机”难道不是自私自利的社会政治势力都打算加以利用的对现实的歪曲吗?眼下,这些问题还用不着回答]

“为什么”在喀麦隆人人都参与政治,

都以为自己不受大人物意志的影响?理解了决定政治参与的因素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这些决定因素顺应了个体热衷于政治的倾向,但是,由于人们不一定意识到这些决定因素,或者由于愿意拔高自己的行为,所以他们很少提及这些决定因素:

我之所以进入政坛,是由于我的信仰和我身居要职的经历(全国民主进步联盟主席麦加里·贝娄·布巴在接受《非洲青年》[1992年5月,第1637期]采访时如是说,他曾任总理[1982—1983],现任国务部长)。

我在这里是为过去和现在都靠边站的人们服务(共和国国防运动全国协调人戴萨拉·达克尔在接受《迪卡罗》采访时说了这番话,他曾任一个国营公司的董事长,曾图谋政变,未遂,入狱7年,1991年大赦时获释,曾任部长、议员)。

我正献身于还政于民的事业(社会民主阵线主席、书商、前执政党 RDPC 党员,保罗·比亚总统的主要政敌约翰·福如·恩迪如是说,引自《SDF 一回声》第4期,1992年2月)。

我致力于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变革,我赞成一种负责任的反对派立场(UDC 主席亚达莫·恩达姆·恩乔亚如是说,他是福班苏丹的表兄弟,曾任对外关系部代理部长,后任艾乔政府的教育部长、议员、福班市长,引自《喀麦隆论坛报》1991年10月22日)。

这里,需要透过表面辞句,由表及里,准确地把握诱使人们参与政治或军事行动的原因,同时撇开自述经历时列举的那些理由不谈,尽管从他们的过去也可以发现这些决定因素(家庭传统、社会背景、教育或职业经历、年轻时接触的人、管理公共事务的早年经验)。可以看出,一个人要么是在职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等等不同的环境下,要么是在“结构性不定”的环境下(Dobry, 1992)参与政治的。除去价

值或道德这些真诚的理由外, 还有其它难以启齿的理由导致人们投身于喀麦隆的政治或军事行动。这些理由或许因为不那么高尚, 或不那么显著而常被掩盖起来, 但它们在推动政治参与方面仍起到很大作用, 而且可以帮助理解有关回报的问题。我们一般都能运用布劳德(Braud, 1995)设计的类型分析喀麦隆的情况, 这些类型把回报分为三种: 物质或潜在的物质回报(谋取要职、额外津贴、关系网、出国旅行); 同附着于权力的利益有关的回报(提高社会地位或进入统治集团, 获得荣誉、声望的权利); 以及心理和情绪上的回报(社会认可、政治权术的乐趣、经常处于伟大神圣的状态、自我评价的满足)。无论如何, 通过分析大人物对自己参政原因的叙述——当他们意识到或承认自己参与政治的直接动机时——或者通过分析其他参政者对其表面动机的描述, 就可以理解回报的各种类型。

从另一方面看, 这第二种教训使我们也能运用沙姆皮特(Schumpeter, 1972)关于控制政府的竞争理论来分析喀麦隆政治, 以及前面提到的SDF的“调查”情况, 根据该理论, 任何一个中尉都是政府或政党(这两个领域并不一定重叠)首脑的潜在竞争者, 每一位部长或党务官员都在绝对效忠于领袖、党派利益和为个人利益(前面提到的回报或自己的前程)而“自行其事”之间寻求平衡。反过来, 政府或政党领袖则需要或明或暗、或内或外地恩威并举, 既威胁又妥协, 既惩罚又奖励, 既指责又提拔, 以确保政府或政党的集团利益以及他个人的权威地位, 就是说, 让他个人能表达或保障这些集团利益。此外, 这种教益还表明, 在喀麦隆, 政党特别是反对党, 在不同的场合提供的政治产品(主题、问题、论点或辩论)是各式各样、变化多端的——就像目前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定义一样, 它们

越来越倾向于首先(不是惟一的意思, 而是基本的意义)以某种“局外人”(Caxie, 1993)的身份露面, 似乎是对各政党及其下属组织(后援会或地方俱乐部)之间剧烈竞争的客观表述, 然后才是政治市场中不同党派斗争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喀麦隆各政党的语言的多姿多彩才得以维持和滋养。

颠倒了新闻人和政治家的关系

“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在政治、新闻和学术研究的交界处, 给喀麦隆的公众话语引入了一个新的中介立场。这个立场由新闻人开创并占据, 使他们能参与公众话语, 并清除掉当权的政客们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 尽管政客们在“转型”的白热化阶段曾向新闻人求援, 但还是指责他们。罪名之一是, 新闻人非法操纵政治, 尽管他们没有资格, 就是说没有得到政治市场上既有势力的委托, 更糟的是没有代表性, 却在规定的地点(广播和电视)就规定的话题(危机、良好的政府、安全)议论不休。结果, 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的界线完全被打乱了。

可以说明的是, 新闻人介入公众话语采取了两种方式——特别是那些为私人媒体工作的新闻人, 因为不属于国有媒体, 所以至少从形式上(因为媒体违规仍属刑法范畴)与政权没有监护关系。首先, 决定事件是否重要(Meyer, 1991), 虽然没有明说这是新闻人的分内之事, 但他们被赋予了公信力: 尽管由于怕受惩罚(常常很严厉), 或怕读者(潜在的或实际的)和支持者(明的或暗的)不信任, 他们对很多事三缄其口, 但是, 他们有能力把一些事件弄成“内幕新闻”, 公众话语中的各派大人物, 特别是那些体制内的大人物, 对此是不能忽视的, 哪怕他们嘴上不承认。这样, 新闻人就

把喀麦隆的当下事务按重要性分成三六九等。除这个积极作用外,这些新闻人(也许这一点更重要)还影响到人们看待事件的态度(Meyer, 1991)。即使民意测验提供的事实和数据没有说明力,但新闻人的评说或者就公众话语中流行的重大问题(腐败、教育、治安或健康)发表社论,都明显有助于影响读者认识那些重大问题的方式,也许还能逐渐影响更广泛的“公众”。通过委托、实施和评论“民意测验”,来弄清楚“SDF 大会后谁将出任 SDF 主席”,报刊和它们的记者让人确信:肯定会就该党的领导职位展开竞争,赢家和输家将大白于天下。“将有一场角逐……”或“曾有一场角逐……”之类的句子频繁出现在评论员的文章中,可以说,他们通过委婉的方式,对平息喀麦隆政坛的政治纷争做了一点贡献。

绕开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限制

“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是一种“产品”,特别适于应付日益阻碍着喀麦隆私人媒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技术和资金限制,与由来已久的“人民舆论”(或路边)的采访技巧不同,民意测验使这些报纸能在快捷之外又加上科学性(Bourdieu, 1987; Meyer, 1991):给读者提供事实和数据,造成客观公正的印象,这是人们越来越期望于喀麦隆的纸媒的。民意测验还能让它们随意编造“事件”或“内幕新闻”(“60%的喀麦隆人反对建立全国选举监测中心,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一个全面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保罗·比亚在青年人中仍受到欢迎”),结果,这些民意测验灵活多变,可以适应任何话题和竞争的要求。

这一教训涉及各种经济因素。作为信息的供应者,严格地说,作为挣钱的机器,

私人报纸希望以最便宜的价格采集信息。从这个观点看,“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提供了一个成本较低的工具,可用来填满政治评论栏目,比以往的手段更吸引读者,无论如何,读者是不能流失的。此外,为这些媒体工作的新闻人的报道、组织和分析工作对新闻的采编起到决定性作用。经验最丰富的记者(恩加威、玛那、莫维埃、芒加、伊欧玛的恩托、阿泽巴泽、西帕、里姆、巴通盖和卡姆归亚,他们大多从《信报》开始其记者生涯)都喜欢写炫耀才华的评论,以展示他们的才学和对事件的理解,尽力表达他们对相关争论的看法。结果,私人媒体的“顶尖级”评论员与喀麦隆的政客频繁接触,彼此非常“熟悉”(Gaxie, 1993),远远超过他们任何一方愿意承认的程度。评论员们利用民意测验,将之称为“公断”(Habermas, 1978)——尽管没说曾经参照了哈贝马斯对这个概念的看法——这使他们有机会让自己区别于政客:正是借助民意测验,他们才能在文章中表达由“事实”和“数据”支持的一套正确信念,才能使他们最赞同的立场与政治立场相区别,尽管他们和后者结论常常殊途同归。新闻人时常面临缺乏合法性的困境,不得不与诋毁者们短兵相接,对方不仅否认他们代表民意,而且直接驳斥他们的言论,新闻人不得不求助于“公众舆论”,或长期以来一直被精英、当局和国家体制看作是公众舆论而发表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对“民意测验”的统计结果的解释,这些测验由他们委托进行,结果也由他们发表。换句话说,他们一直在表面上向政客们(作为劝说对象)施以颜色,写批评文章为“真正的民主”辩护,千方百计地说服这些政客。

从所有这些教训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单纯指责喀麦隆公众“民意”测验的人为性,将使我们失去很多东西,因为这

个工具的实际作用远远超过它狭隘的目的或限制。“民意测验”出现在喀麦隆,这已经引出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及其动力的问题,同时提供了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研

究领域。

[祝东力译]

注 释

1. 这里指的是后殖民时期,人口学性质(人口规模以及按性别、地理位置、住房及移民等的人口划分)或经济学性质(关于自然资源、现有经济基础、必要的税收工作和其它金融税赋、农田统计等等的知识)的数字。除了为明显的政治目的服务之外,“民意测验”技术对人种学(“关于非西方人的科学”,即对他们的文化特征、风俗习惯、经济生产功能及文化转化过程的研究)也有很大贡献,这样就给那些实行殖民制度的人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请特别参见 Hoffmann, 1963; Stoet ze, 1953)。
2. 巴翁德拉是开展民意测验的喀麦隆非政府组织的主任,引自《喀麦隆特种民意测验卷宗》,见 *Mutations* 特刊, No. 1019, 12—18 Novembr, 1996; 另参见 *Mediametricam*, August 2000, p. 5。
3. 本文提到“转型”时全部用引号,以区别于奥唐耐尔、史密特、怀特海(1986)和多比利(2000)提出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进程,虽然“转型”说的是另一种情况,但对于分析喀麦隆的形势仍是贴切的。
4. 最恰当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转型高峰时期《挑战赫伯多》报进行的“民意测验”;发表在2000年1月10日《信报》电子版上的经济学和民意测验研究中心(CRETES)进行的“反腐败运动民意测验”;2000年3月31日全国公民行动委员会在大会辩论阶段为“确定年轻人对国家元首保罗·比亚总统的看法”而进行的“民意测验”,2000年5月17日在《信报》电子版上再次刊出。第一个测验笨拙地使用已经过时的“假

- 投票”手段,而在第二个测验中那些假定代表“当前喀麦隆社会”的投票人是由生活在杜阿拉或雅温得的“200人”组成的,在问题已有答案或配以多项选择的情况下,要求被测试者“给出选择的原因”(Engueleguele, 2000)。第三个采用了随机测验的新花样,1985年安德斯·奇亚尔在其它地方率先采用,它使局部有可能代替整体而又不产生偏差,条件是在抽样时随机选出被测试者(关于这个方法,请参见对它的批评意见,以及取代它的“代表人方法”,见 Desrosieres, 1993; Kruskal & Mosteller, 1980; Meyer, 1991; Seng, 1951)。
5. 参见喀麦隆立法大会档案中的演讲全文,卷宗5—57,1957年5月12日,第1—3页。
 6. 参见演讲全文,见AGNU的官方文件A/C.4/SR,第571页,1959年2月。
 7. 萨缪尔·卡姆员责培训党内官员:“UC应该是群众政党还是精英政党?动员群众。政治对手”,参见《喀麦隆联盟》,UC政治家第一届培训班,雅温得,1961年8月1—6日。
 8. 这句话出自喀麦隆一位高级官员之口。有趣的是,与大多数讲法语的非洲国家一样,喀麦隆的首次“民意测验”也始于殖民时期。那些“民意测验”是法国海外领地部设计的,放在一本小册子《非洲人的意识和民意》里面,1957年第3版,其偏爱的主题是对以前的某个部落的人口普查。来源:采访。
 9. 戴罗·萨里曾任公民事务和行政改革部部长,他在回答《民主人士》的调查记者保罗·埃桑

姆巴时如是说, 1999 年 10 月 22 日。

10. 应该强调的是, 这种“对年轻人权益的公开测验”, 并非由独立自主的人随意设想出来的, 它要考虑满足世界银行为允许喀麦隆进入最贫穷的负债国减免债务的行列而提出的各种条件, 其中一个就是对教育的要求。因此, 与政府尤其与喀麦隆总统关系密切的《爱国者》报的“民意测验”就成为某种策略, 通过权威人士宣布某种测验结果来捞取宣传上的好处, 这些人士小心翼翼地掩盖着外界的真实

情况; 这也许标志着政治领袖对这个工具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

- 11. 让-巴波蒂斯特·西帕,《通过什么办法能让 90 年的暴力报复活动转化成和平的民主运动?》, 见《信报》电子版 2000 年 3 月 4 日。
- 12. 皮乌斯·恩加威,《为了辩论!》, 见《信报》电子版 2000 年 1 月 24 日; 安姆博伊斯·埃邦达,《喀麦隆: 政府的对立面, 内部的陷阱》, 见《信报》电子版 1998 年 11 月 7 日。

第 147 页参考文献部分移至此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i>Social Science Bulletin</i> ,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V, No. 3, UNESCO, pp. 527–536.	WRIGHT MILLS, C. 1967. “Les publics et la société de masse”, in Padioleau, J.G., dir., 1981.	<i>L'opinion publique. Examen critique, nouvelles directions</i> , Paris-The Hague, Mouton.
---	--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本页未完部分转入第145页末)

- BEYLE, H. C. 1935. "Determining the effects of propaganda campaign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 108.
- BLONDIAUX, L. 1997. "Ce que les sondages font à l'opinion publique", *Politix*, No. 37, pp. 117-136.
- BLUMER, H. 1948. "L'opinion publique d'après les enquêtes par sondages" in Padioleau, J.G., dir., 1981. *L'opinion publique. Examen critique, nouvelles directions*, Paris-The Hague, Mouton.
- BLUMER, H. 1955. "Collective Behavior", in McLung Lee, A., ed., *An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st ed. 1939.
- BON, F. 1991. "Langage et politique", in Schemeil, Y. *Les discours de la politique*, Paris, Economica.
- BOURDIEU, P. 1987. "Le sondage. Une science sans savant", in *Choses dites. Le sens commun*, Paris, Minuit.
- BRAUD, P. H. 1995. *Sociologie Politique*, Paris, LGDJ, 4th ed.
- CONAGHAN, C. 1995.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Approaches to Methods and Analysis*, Peter Smith.
- CONVERSE, P. 1987.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51 (4), p. 14.
- DESROSIERES, A. 1993. *La politique des grands nombres. Histoire de la raison statistique*, Chap. 7, Paris, La Découverte.
- DOBRY, M. 1992. *Sociologie des crises politiques*, PFNSP. 1st ed. 1986.
- DOBRY, M. 2000. "Les voies incertaines de la transitologie. Choix stratégiques, séquences historiques, bifurcations et processus de path Dependenc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50, No. 4-5, pp. 585-631.
- DURHAM PETERS, J. 1995. "Historical Tensions in the Concept of Public Opinion", in Glaser, T. and Salmon, C. 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ENGUELEGUELE, M. 2000. "Cameroun. L'opinion publique: une notion à géométrie variable", *L'Afrique Politique*, Karthala CEAN, pp. 59-88.
- FOUCAULT, M. 1969.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 GALLUP, G. 1937. "Testing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Supplement to Vol. 1, "Public Opinion in a Democracy", p. 9.
- GALLUP, G. 1953.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o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Vol. V, No. 3, UNESCO.
- GAXIE, D. 1993. *La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Clefs Montchrestien.
- GUNN, J. A. 1989. "Public Opinion", in Ball, T., Farr, J. and Hanson, R.L., ed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78. *L'espace public*, Paris, Payot, 1st edn, 1962.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 J. & ROBERTS, B. 1994.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Law and Orde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st edn, 1978.
- HOFFMANN, M. 1963. "Research on opinions and attitudes in West Afric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XV, No. 1, p. 62.
- KRUSKAL, W. & MOSTELLER, F. 1980.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IV: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in Statistics. 1895-1939",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 No. 48, pp. 169-195.
- LIJPHART, A. 198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 LIPPMANN, W. 1925. *The Phantom Publi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MEYER, P. H. 1991. *The New Precision Journalism*, electronic version available in full on website <http://www.unc.edu/~pmeyer/book>.
- O'DONNELL, G., SCHMITTER, P. C. & WHITEHEAD, L.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RICE, V. 1992. *Public Opinion*, Newbury Park, Sage.
- QUANTIN, P. 2000. "L'institutionnalisation du politique: les leçons de la démocratisation et celles de la guerre", *L'Afrique Politique*, Karthala-CEAN, pp. 15-18.
- SCHUMPETER, J. 197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Capitalisme, socialisme et démocratie*, Paris, Payot.
- SENG, Y. A. 1951.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ampl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1, pp. 214-231.
- STOETZEL, J. 1953. "The contribution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techniques to social anthropology", in the *International*